

缭绫浴袍小考

——从法门寺地宫物账碑衣名谈起

赵 丰

(中国丝绸博物馆)

关键词: 法门寺地宫, 缭绫, 浴袍, 盘绫

摘要: 在法门寺地宫出土并保存较为完好的上衣共两件, 而地宫同时出土的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94年)《物帐碑》上记载的上衣共有花罗衫、花罗袍、长袖、夹可幅长袖、可幅绫披袍、纹縠披衫和缭绫浴袍等多种名称。本文通过出土文献和实物的比对, 确认了其中一件为明确记载的缭绫浴袍。这是一件以独窠盘绫纹样为主题、以平纹地上六枚斜纹显花为组织、采用平袖和对襟制成的浴袍, 用于浴后未干之时服用。此件缭绫浴袍的发现和还原, 对于研究唐代服饰史、中国丝绸史、纺织科技史和江南经济史都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KEYWORDS: Famen temple, *Liaoling* damask, Bath robe, Knotted ribbon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reserved upper garments excavated from the underground depository of the Famen Temple. Meanwhile, six types of recorded upper garments on the *Inventory of Donated Objects* dating back to 894 CE were found in the same depositor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study of the real garments and the inventory,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one of them is the bath robe of *Liaoling* damask, with a selvage wide roundel of knotted ribbon as motif, weft twill as pattern on plain weave ground, flat sleeves and vertical front opening as a robe style. It was likely worn immediately after a bath while the persons body was still damp. The research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is bath robe of *Liaoling* damas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ang Dynasty costume, Chinese silk history, textile technology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Southern China.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保护与研究法门寺丝绸的框架协议下, 我们在法门寺考古发掘约35年后得以详细考察地宫出土丝绸服饰的现状^[1]。随着《金缕瑞衣: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丝绸考古及科技研究报告》

(以下简称《研究报告》)的最新出版^[2], 法门寺丝绸服饰研究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 新材料的发布为更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来看, 地宫出土保存较为完好并已展出的上衣共两件, 即直领对襟罗衫(T68-F/B1-F)和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T68-D/B1-D), 而根据地宫出土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四日《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以下

简称《物帐碑》)载, 地宫中当时贡献进入的上衣有花罗衫、花罗袍、长袖、夹可幅长袖、可幅绫披袍、纹縠披衫和缭绫浴袍等名^[3]。本文将从法门寺地宫出土丝绸上衣的名物比对出发, 在其中寻找唐代著名的缭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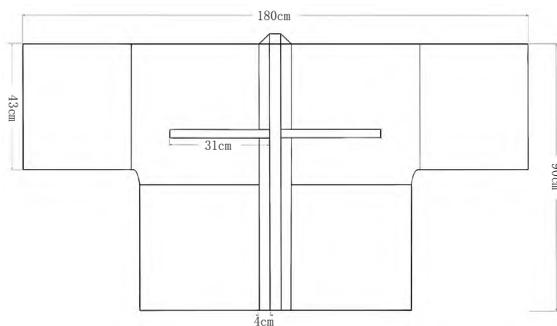
一、物帐中的上衣名称

《物帐碑》中记载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席褥、幞头、巾子、花鞋等共计七百五十四副, 根据韩伟先生的释读, 其中上衣类文物有^[4]:

花罗衫十五副: 内襦一副, 跨(袴)八副(各三事);



图一 法门寺地宫出土直领对襟罗衫



图二 法门寺地宫出土直领对襟罗衫服装结构

花罗袍十五副：内襴八副，跨（袴）七副（各四事）；

长袖五副（各三事）；

夹可幅长袖五副（各五事）；

可幅绫披袍五领；

纹縠披衫五领；

縠绫浴袍五副（各二事）。

这里所涉及的上衣名共有衫、袍、披袍、披衫、长袖、浴袍等六种，我们就从最为明确的部分开始进行对比。

1.花罗衫

衫是唐代常见服装用词，一般均指上衣，有时可与襦互称，有时亦可与袍并称。但从《物帐碑》同时有花罗衫和花罗袍的语境看，这里的花罗袍当指衣身较长的上衣，而花罗衫为短上衣。张泌《江城子》云：“窄罗衫子薄罗裙。”^[5]上衫下裙，衫也是短上衣。花蕊夫人《宫词》中有多处提及罗衫：“薄罗衫子透肌肤”，“罗衫玉带最风流”，“少年相逐采莲回，罗帽罗衫巧制裁”^[6]，都是同一类上衣。日本正仓院的服装有以“衫”为名者，如“汗

衫”“布衫”等，亦均为较短的上衣，衣身在80厘米左右，而袍身长一般都在110厘米以上^[7]。法门寺地宫出土有直领对襟罗衫（T68-F/B1-F）一件（图一^[8]、二）。据报告：衣长约90、衣摆宽约100、通袖长约180、袖宽37厘米。其面料为泥银花罗，罗呈红棕色，为小团花纹样，上用泥银绘制球路纹组成六边形的底纹，六边形内装饰对鸭和朵花纹。白居易诗有“银泥衫稳越娃裁”，用的正是这样的银泥^[9]。两者可以自然地名物相对应，此件直领对襟罗衫即为花罗衫，没有任何疑问。

2.花罗袍

袍一般指衣身较长的上衣，唐代广泛用作外套。文献中提及的袍服、缺胯袍等，都是明确的长上衣。唐代的袍实物很多，身长一般都长过膝盖，长窄袖，右衽，前襟两侧在胸前有重叠，下摆渐宽，有时还有横襴等装饰，称为襴袍，有时背后有开胯，称为缺胯袍。考古发现中以甘肃天祝唐慕容智墓所出保存最为完整，目前已整理发表的是锦襴紫色对凤纹绫袍（G:29-1），圆领右衽，衣身长135、通袖长243



图三 慕容智墓出土锦襴紫色对凤纹绫袍



图四 日本正仓院藏大歌袍

厘米。主体面料为紫色团窠对凤纹绫，领口和袖口襷有黄地团窠对狮纹锦，内衬绢^[10]（图三）。慕容智曾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入侍宫廷，担任禁卫军职，宿卫皇帝。《新唐书·车服志》载“武后擅政，多赐群臣巾子、绣袍”。绣袍的款式应与慕容智这一袍子相同。传世实例则有日本正仓院的大歌袍、昆仑袍、布袍等，其中大歌袍衣身长116、通袖长218厘米，用绿色双珠团窠对龙纹绫作面料，内衬绢，绢上有墨书“东大寺大歌袍 天平胜宝四年（752年）四月九日”，刚好是东大寺建成开光之年^[11]（图四）。



图五 敦煌390窟所见小袖式披风

《物帐碑》记录的袍是花罗袍，在地宫没有找到对应实物。如能找到，应该会采用与花罗衫相似的面料，即银泥或金泥装饰的四经绞罗，但其款式应该与一般的袍服相同，衣身长可达120厘米左右，通袖长在200厘米以上，圆领且是右衽。

3.披袍

披袍名为袍，应该也是衣身较长的外套，总体应该比袍更为宽松。《旧唐书·安禄山传》载：“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厅引坐，以己披袍覆之。”^[12]王延彬《春日寓感》有“软锦披袍拥鼻行”^[13]。后蜀和凝（一作孟昶）《临江仙》词：“披袍窳地红宫锦，莺语时啭轻音。”^[14]

披袍的式样应该类似于今天的披风，可在敦煌壁画供养人物形象中看到。莫高窟390窟中就有供养人穿着沈从文所称的小袖式披风（图五），有的衣长拖地，后有侍女帮着提起^[15]。这些小袖有时甚至还是假袖，无法真正穿上，只能披着。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获取、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千佛刺绣上也有供养人像穿着类似披风，也应该可以称作披袍^[16]。

4.披衫

在《物帐碑》的语境中，披的概念是比较宽松的上衣，衫的概念是身长较短的上衣，顾名思义，披衫应该是较为宽松的短上衣。另外，这

件披衫用的面料是象绉纱一样的纹縠。縠是轻薄的、表面起绉的织物，在法门寺地宫也有出土，是一件保存相对完整的棕色织物（T14-2），其幅边保存完整，经线密度约75~80根/厘米，纬线密度约50根/厘米。但《物帐碑》上记载的是纹縠，应该是织有纹样的縠，推测还是经、纬丝线较细，并加有强捻的绫织物，但因为其表现效果起绉，所以称之为纹縠。

披衫一词在唐诗中也能见到。和凝《天仙子》载：“柳色披衫金缕凤，纤手轻拈红豆弄。”^[17]可见在宫中也有披衫的流行。

5.长袖

相对于衫、袍、披衫和披袍，长袖作为唐代服装的一种款式更具不确定性，因为服装有“长袖”者甚多，“长袖”听起来只是上衣的一个局部，而不是整体。

不过，在唐代，长袖确是一种服装的款式，常见于春衣和冬衣成套的服装之中。在唐代实行募兵制之后，“春衣”和“冬衣”就是唐代健儿包括所有将士的重要衣装来源，我们经常可以在唐诗或敦煌文书中看到相关资料。同时，唐王朝对朝中重臣、地方州府长官、藩镇僚属官员等也都赏赐春衣和冬衣。

敦煌文书S.964《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年）兵士衣服支給簿》，经孙继民考证改为

《唐天宝九载十载某部军人衣装（或称衣服、衣资）簿》（简称《衣装簿》）^[18]。其中可以看到春衣和冬衣的具体组成。

《衣装簿》共保存了八位军人的名字，我们以第一位张丰儿春衣和冬衣清单为例。其中的春衣一套包括蜀衫、汗衫、裤、袴奴、半臂、幞头、鞋、袜；冬衣则包括长袖、绵袴、幞头、鞋、袜。这是当时唐朝健儿（也包括所有军人）衣装的基本配置，由上衣、下衣和幞头（头巾之类）、鞋、袜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衣装簿》中，天宝九载（750年）的春衣“半臂”在天宝十载换成了“长袖”，说明二者似有类似功能。五代冯鉴《续事始》引



图六 慕容智墓出土唐代绢半臂



图七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夹纈罗半臂

《实录》曰：“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襟，即今之长袖也。高祖减其半，谓之半臂。”赵贞认为，长袖和半臂二者本为一物，仅袖之长短略有不同而已^[19]。也就是说，长袖和半臂区别只是在于袖子的长短不同，而在款式上应该是统一的。我们没有直接找到长袖的款式，但可以从半臂的款式来推测长袖的款式。

完整的唐代半臂出土和收藏也要数慕容智墓和正仓院。慕容智墓中出土了约有三件半臂，其中缠枝团窠鹿纹锦半臂（G:44）为右衽半袖，衣身总长93、宽57~86厘米。整个衣长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深黄地缠枝团窠鹿纹锦，下半部为深蓝色菱格纹罗。另一件绢半臂在中国丝绸博物馆《西海长云》展中露面，款式也是右衽半袖，单层绢面，衣身长107、宽约80厘米^[20]（图六）。而在正仓院中所收藏的半臂数量也不少，有浑脱半臂（长86、宽52.5厘米）、茶蜡纈罗半臂（长104、宽77厘米）、夹纈罗半臂（长90、宽72厘米）等^[21]（图七）。

从正仓院藏多件唐代半臂和慕容智墓出土唐代绢半臂和织锦半臂的情况来看，这些半臂都是交领，右衽，上下在腰部被分成两截，上面是半臂的正式面料区，较为光鲜，下面较为素静，作为下摆。进一步，我们推测长袖的款式应该也是交领右衽，上下分为两截，上截装饰较多，下截基本为素。衣身长与半臂相近，在80~100厘米之间，但通袖长也许可以达150~200厘米左右。

这样，经过层层对比和排除，《物帐碑》所记衫、袍、披衫、披袍和长袖的款式，应该都与地宫出土的另一件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不相符合（图八），而唯一可能与之相配的只剩一条记载，那就是：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

二、浴袍

通过前面的比对，我们找到了《物帐碑》中关于衫、袍、披衫、披袍和长袖的实物或图像，基本明确了它们的款式，碑中记载而没有

明确款式上衣只剩下浴袍了。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件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比对为《物帐碑》中所载的“缭绫浴袍”。这是第一次发现实物的浴袍，也是第一次发现实物的缭绫，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先对这件浴袍进行一次详细地观察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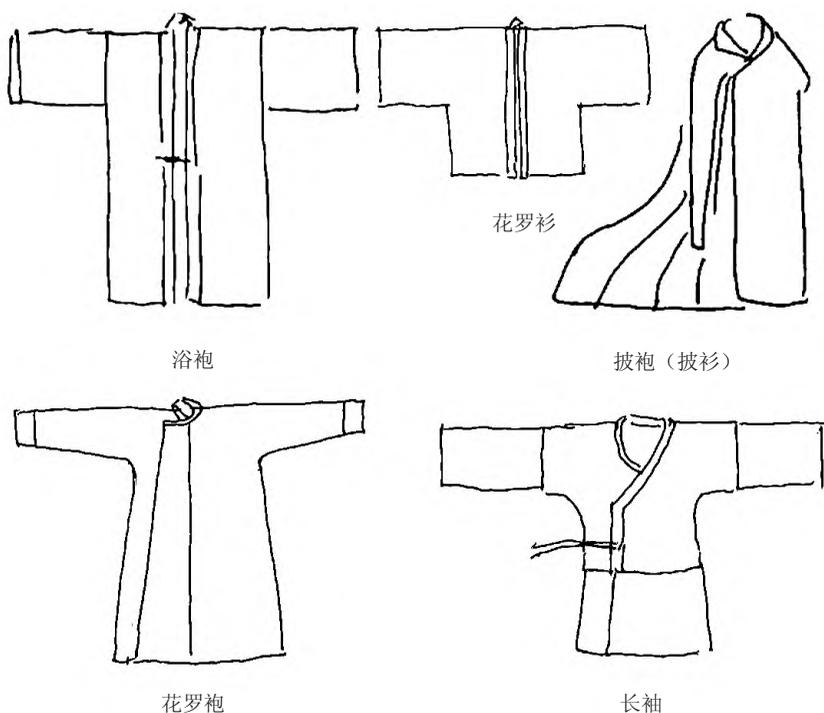
1. 结构与尺寸

事实上，这件浴袍里还套着一件款式相同的衣服，叠穿在一起，在袖口处卷起后用丝线固定，从衣领和袖口处能看到明显的叠压关系。因保存状况差，纺织品保护师未对衣物进行脱卸和分离。所以目前长袍仍处于对折状态。我们看到的，只是长衫外层的右侧的正面部分。但好在整件服装形制基本对称，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侧看到整件衣服的情况（图九），也可以根据一半来得到完整的尺寸：衣身长134、通袖长约168、袖宽38厘米（图一〇）。

浴袍的款式很像一件和服，由两侧接袖及衣身三大片织物构成。衣身宽约60、长约130厘米，应该恰好是一个完整的幅宽。整块织物应该就在肩部折回，前身沿经线方向在中间剪开，形成门襟。门襟处使用绫织物对折镶边，边宽约4厘米。门襟上面为衣领，总领长约78、领宽4厘米。门襟距地约70厘米处两侧有系带，带宽约2、残长8厘米，缝合在门襟内侧。

袍子左右两片接袖非常平直，袖长各为57厘米，除去缝合边，其实也正好是一个幅宽。袖宽38厘米，由整片织物对折后与衣身缝合。袍子下部两侧开衩，衩高约为33厘米。

里层对襟长衫的形制虽未看到，但从目前两层长衫套穿非常平整、前襟与袖口少量露出的情况来看，应与外层基本一致。但其织物面料应该与浴袍外层不同。



图八 法门寺《物帐碑》所录上衣名及基本款式

2. 一副二事

《物帐碑》上的记载是“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这里的浴袍量词用的是副，说明有着多组，五副就是五组。每组各有二件（事），对照对襟长衫刚好还有一件相同款式的绫袍套在浴袍里面，并在袖口用针线轻轻缝合，刚好就是记载中所说的一副二事，其实是里外套穿，这也说明浴袍的记载和这件实物两者之间的对应。

从局部露出的织物看，里层对襟长衫的领子、衣身、系带均为同一单层绫织物，组织为平纹地1/3S斜纹显花，纹样不清，但明确与外层的绫不同。

从外层对襟长衫的裁剪方式来看，目前的正身宽和袖长均是一个完整的幅宽，与唐代丝织品宽一尺八寸正好吻合，我们可以大约以60厘米来计。

这件浴袍的用料非常节约，由于款式简单明了，我们很容易就能画出其排料图，并算得其总耗料量：前后每个身长是130厘米，共260厘米，袖宽38厘米，两袖前后4片就是152厘米，这样总耗绫料为412厘米，如加上缝边，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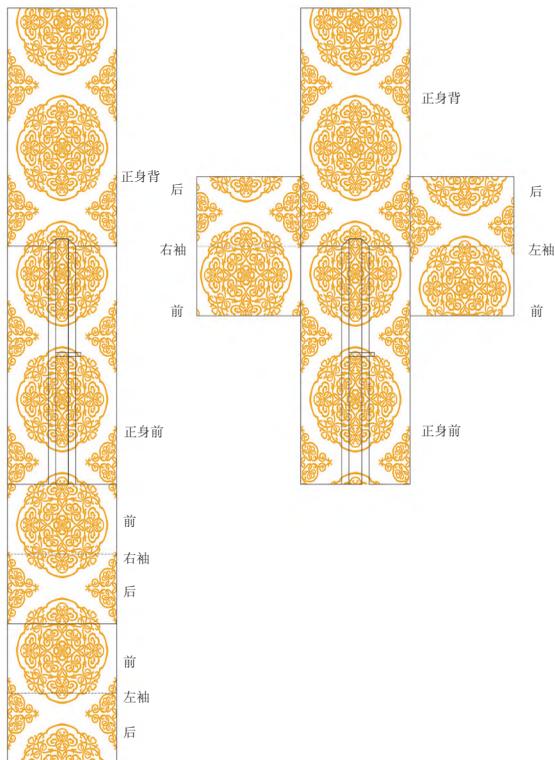
图九 法门寺地宫出土缥绫浴袍
(浴袍左半边为右半边的镜向重复)

加上领子、带子等，这件浴袍的表层面料共需绫料约4.5米长(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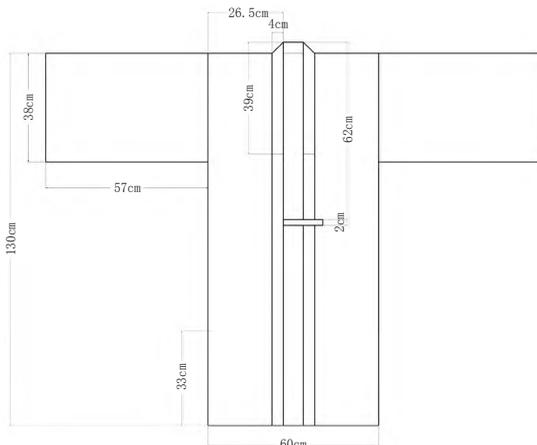
3.浴袍的用法

以前我们对浴袍的研究极少。从文献来看，浴袍或称浴衣，是古代一种贴身的单衫，它的作用就是浴后所穿。《仪礼·士丧礼》：“浴衣于篋。”郑玄注：“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为之，其制如今通裁。”

已浴所衣之衣，也就是沐浴之后所穿之衣，与今天的浴衣用法相近。南北朝时期把这



图一一 缥绫浴袍裁剪排料图



图一〇 法门寺地宫出土缥绫浴袍尺寸

种浴衣称为明衣。南朝皇侃《论语义疏》有云：“谓斋浴时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着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不为衣，如衫而长身也，着之以待身燥。”就是说洗澡以后，身体上的水分还没有完全干燥，不能穿换洗好的衣服，但是赤身露体也不雅观，这时披上浴衣(浴袍)，等着浴后身体上的水干了。唐孟浩然《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诗：“讲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指的也应是这种浴袍。

从法门寺的这件浴袍尺寸看，衣长132厘米，正好是一身的长度，差不多正是从肩到脚腕处长度。通袖长180厘米不到，较双手平伸时稍长。身形平直，对襟而开，胸围120厘米，中间仅有一根系带系缚，袖形开阔，十分适合浴后的穿着以及遮蔽。从功能上来看，这件上衣也没有比浴袍更为合适的用途了。

三、缥绫

这也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件能够名物对应的缥绫实物。以前我们对缥绫的研究基本只是停留在白居易的《缥绫》一诗，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这件浴袍面料，再对缥绫进行一番详细地考察和研究。

1.缥绫的组织

浴袍的面料包括衣身、袖子、领子等均使用同一整块团窠盘条纹绫，织物的组织结构是平纹地上1/5Z斜纹显花，经线密度58~64根/厘

米，纬线密度32~42根/厘米。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属于平纹地上显斜纹花，从定名来看，考古学的定名常称其为绮，但在唐代它已归入绫的范畴，可以称为平地绫。平地绫的种类也



图一二 缭绫组织结构图



图一三 缭绫纹样侧视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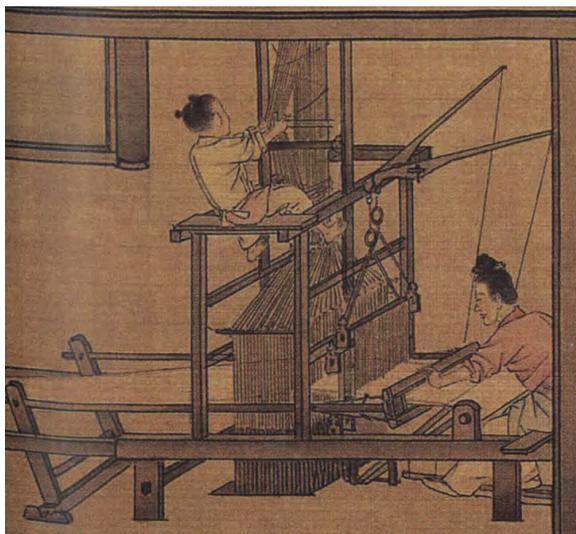
非常丰富，有平纹地显3/1斜纹花、平纹地显1/5斜纹花、平纹地上嵌合组织显花、平纹地上交梭纬浮显花四大类。这件缭绫用的是平地1/5Z斜纹花（图一二^[22]），正与白居易《缭绫》诗中所写“地铺白烟花簇雪”效果相合。白居易用“烟”和“雪”描述了平纹地上显花为主的平地绫，这种绫的表现效果正是地部稍暗，如铺白烟，花部较亮，似堆白雪。而另一句“转侧看花花不定”正是暗花织物图案若隐若现的情况；在阳光下从不同的角度看，图案根据光照角度时强时弱地呈现出来，甚至是时有时无，这便是“转侧看花花不定”的缘故（图一三）。

《缭绫》诗中还有“中有文章又奇绝”和“异彩奇文相隐映”两句，说明缭绫是一种提花织物。关于它的织法，元稹则在《阴山道》和《织妇词》中曾提及。他说浙东的越溪寒女在织越縠缭绫时，“挑纹变纴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缭绫织一端，十匹缣素功未到”^[23]。这里的“纴”是织造技术中的关键，它显然是指束综提花机花本上的耳子线，变纴撩机是指每提一次花时要换一根耳子线变纴，然后把花本拉起提花（撩机）；挑纹变纴则是辑挑花结本时亦要变换耳子线，一根一根地挑。由此看来，织用缭绫的织机应该就是以线制花本为提花装置的束综提花机，又称花楼机。做缭绫用的束综提花机虽在唐代未有图像留传，但南宋初年的《蚕织图》中有一架绫机，用的是两片地综，刚好可以生产平纹地的绫织物，据笔者分析研究，这种绫机是江浙一带常见的绫机，自唐至宋并无大变^[24]（图

一四^[25]）。

《缭绫》诗中还有“四十五尺瀑布泉”和“扎扎千声不盈尺”两句。第一句讲的是缭绫的尺幅。唐代对丝织品的规格也有着统一的规定：“锦、罗、纱、縠、绫、紬、紵、绢、布，皆广尺有八寸，四丈为匹，布五丈为端，绵六两为屯，丝五两为絢，麻三斤为緦。”^[26]可见丝织品的常用单位是匹，每匹长四丈，幅宽一尺八寸。这里用的是唐尺，每唐尺约相当于今天的30厘米，所以当时一匹的长度就相当于1200厘米，而幅宽就在54厘米。这里缭绫的幅宽正是53~60厘米之间，与当时规格相符。

此外，当时一匹的标准长度是四丈即四十尺。而白居易提到的四十五尺应该是中晚唐时期的常见情况。在丝绸作为税赋交纳或作为货币交易的过程中，丈量丝织品尺寸比较麻烦，一般采用称重的方法进行换算。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匹



图一四 南宋《蚕织图》上的绫机



图一五 缭绡浴袍盘绡纹样



图一六 缭绡浴袍盘绡纹样(线描)

超过四丈的情况：“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27]但白居易所说缭绡一匹为四十五尺，约合13.5米，前计一件缭绡浴袍用料为450厘米，这样，一匹1350厘米，恰好是做三件浴袍的料，倒也十分合理。

另一句“扎扎千声不盈尺”说的是缭绡的打纬，也就是织物的纬密。如果真以扎扎千声得一尺来计，可折算成纬密为33根/厘米，而此件缭绡所测得的纬密恰好是在32~42根/厘米之间，两者之间竟是如此吻合，十分令人惊讶。

2. 缭绡的纹样

此件缭绡织物的纹样也基本可以还原。由于浴袍右侧接袖正面部位的纹饰相对完整，再和衣身右侧正面的纹样进行拼接，可以得到纹样总体为团窠外形的盘绡纹样。盘绡纹初看起来总体感觉象团窠宝花，其团窠直径约为53厘米，窠心位于织物的中轴线上，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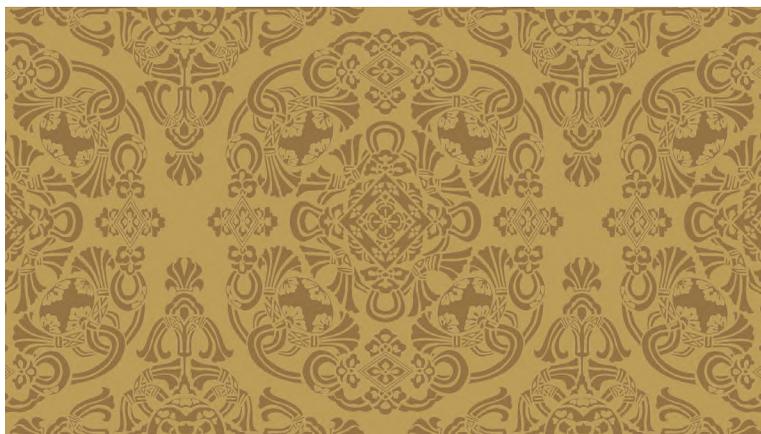
上下对称。两侧靠幅边处，置以半个十字花作为宾花。单元团窠由于纬密的变化不完全是正圆，而是经线方向稍有拉长。经浴袍右前身上图案的实测，这一部分的经向循环为68厘米，纬向循环应该还是整个门幅，约60厘米。图案的经纬向变形比约为

17/15。但如仔细分析，这一宝花其实是由绦带编织而成的，所以正好是唐代晚期十分流行的盘绡纹样（图一五、一六）。

这件盘绡纹初看起来象一个大的团窠，一个门幅中只有一窠，在唐代也叫“独窠”或“大窠”纹样。但到了晚唐，丝织品中又出现了“可幅”一词。《物帐碑》上的这些上衣就用到了“可幅”两字，“幅”应该就是幅，所以碑文可以读为“夹可幅长袖五副（各五事）”和“可幅绦披袍五领”。我们认为，可幅的含义可能就是“合幅”或“通幅”。

“可”较早的意义是作为动词，表示能够、可以。“可”如果加上单音节名词，则表示合适，如可心、可口、可意、可人、可身等。可幅，应该就是图案适合整个门幅，即一个门幅里有一个完整的图案的意思。

长庆二年（822年），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牛李常争的代表性人物李德裕被李逢吉外放为浙西观察使，出镇润州（治今江苏镇江）。长庆四年（824年），唐敬宗继位后不久就诏“令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绡缭绡一千匹”。李德裕于是上了一份著名的《奏缭绡状》据理力争，劝说敬宗撤消此次进贡：“况玄鹅、天马、榭豹、盘绡，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28]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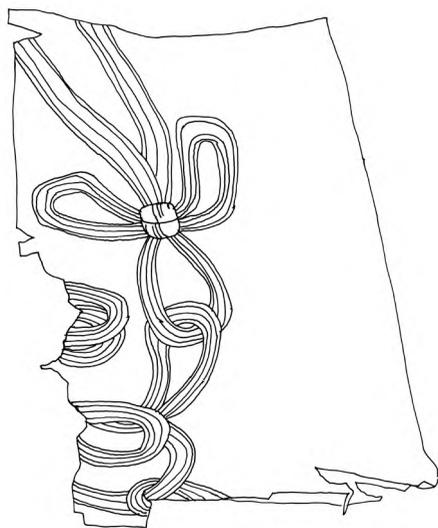
图一七 敦煌藏经洞所出盘绡纹样复原

这里，玄鹅、天马、栩豹都是大型的动物纹样，而前后两次提到的盘绡纹样则与法门寺地宫所出缭绡纹样基本相符。

这样，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件缭绡浴袍的面料，准确说来，应该与唐敬宗要求李德裕织造的“可幅盘绡缭绡”完全一致。

3.晚唐五代时期的盘绡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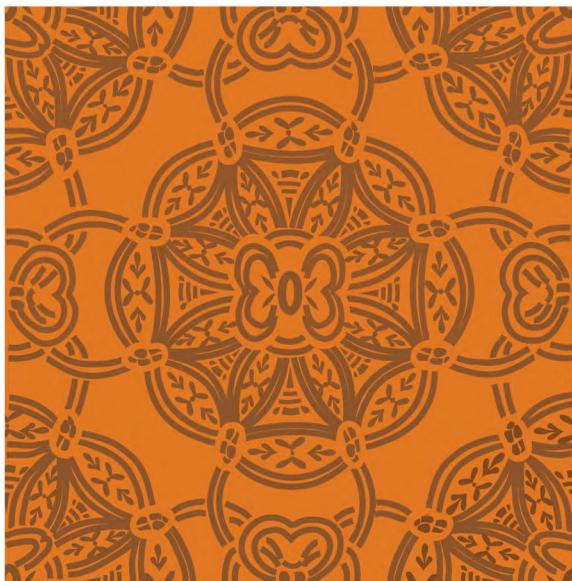
盘绡是中晚唐绡织物上的流行纹样，我们还可以在同一时期或稍晚时期找出一批。盘绡（縹）无疑是一种以绡带盘结的纹样。绡是单根的丝带，縹是编好的绡。《唐六典·少府监》下织染署有组縹之作五，分别是组、縹、绡、绳、纓五类^[29]，盘绡其实就是编绡的作坊，盘成的绡多少有些象今天的中国结。这类纹样在敦煌藏经洞的绡织物中有见，如棕色縹带纹绡（L.S.649），其组织结构为2/1S地，1/5S花，团窠縹带纹的纬向循环为通幅，约在60厘米^[30]（图一七）。此外，在辽代早期（相当于五代时期）内蒙古耶律羽之墓中也有不少发现，墓中出土褐色盘绡绡裤筒（S.78）残长68、宽处49、窄处39厘米，由两片图案基本对称的盘绡纹绡缝接而成，织物的组织为2/1Z地上显1/5Z花。此件盘绡纹绡的图案非常之大，目前尚不能复原整个图案，现有图案的范围起码已有经向为58、纬向为45厘米，但还远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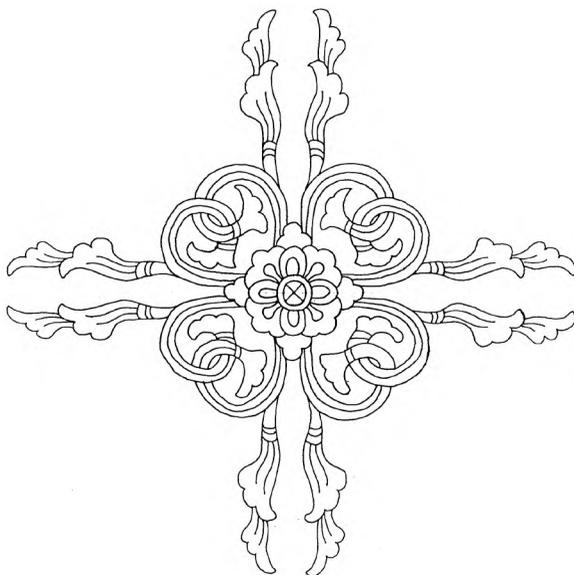
图一八 耶律羽之墓出土盘绡纹纹样

循环（图一八）。可以推测，此绡的图案在纬向是通幅的，而且是不对称图案，要两幅拼接起来后才能对称完整，而在经向的循环也非常极大，起码要在一米以上。这个盘绡纹绡，确实可以看作是“可幅盘绡”的范围。

除此之外，耶律羽之墓中还有一幅两窠中型的盘绡纹绡。如盘球纹绡，它的基本组织结构为2/1S斜纹地上起1/5S斜纹花（图一九）。此类织物共有两件，一为黄色（S.108），一为深褐色（S.110），而深褐色的一件上还有与织物图案相同的描金。纹样是由盘绡卷绕而成的大球，大球之间再以绡带盘绕连接。一个图案



图一九 耶律羽之墓出土盘球纹纹样



图二〇 耶律羽之墓出土盘绡带纹纹样

循环约为26×26厘米，相当于一半的门幅。另一件朱描盘绦绶带绌的地也是绌，组织结构地2/1Z花1/5Z，纹样循环为29厘米，一个门幅里有两个盘绦绶带纹（图二〇）。

四、结论

通过梳理法门寺地宫出土《物帐碑》上的衣物名称，并结合文献和出土实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法门寺《物帐碑》的语境下，衫是短身上衣，袍是长身，一般是圆领右衽窄长袖，披衫和披袍是宽松的短上衣和长衣，而长袖是交领右衽、上下两截，与半臂形制类似，但为长袖的上衣。

2.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浴袍是第一件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浴袍，其款式特点是平袖、对襟的长衣，用于浴后未干之时服用。

3.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浴袍面料用绌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可以有名物明确对应的绌，可定名为可幅盘绦绌。此件绌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丝绸史、中国科技史和江南经济史意义重大。

附记：感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合作研究机会并提供相关资料，研究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赵西晨研究员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路智勇研究员给予详细咨询。

- [1] 本文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保护与研究法门寺丝绸的合作成果之一。本人分别于2020年12月4日和2023年3月31日两次实地考察此件实物。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金缕瑞衣：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丝绸考古及科技研究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27-229.
- [4] 韩伟. 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J]. 文物，1991(5). 文中韩伟改“纹穀”为谷纹，非是，仍作“纹穀披衫五领”。

- [5] 彭定求. 全唐诗（第898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0148.
- [6] 彭定求. 全唐诗（第798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8971-8981.
- [7] 关根真隆. 奈良朝服饰の研究（图录编）[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74:112-143. 例如：大歌袍身长141厘米，紫绀袍身长135.5厘米，布袍身长118厘米，而长袖布衫55.5厘米，白盘布衫81.5厘米。
- [8] 同[2]:68.
- [9] 彭定求. 全唐诗（第455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5161.
- [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J]. 考古，2022(10).
- [11] 米田雄介，杉本一树. 正仓院美术馆[M]. 东京：讲谈社，2009:272-275.
- [12] 刘昉. 旧唐书（第200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68.
- [13] 彭定求. 全唐诗（第763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8666.
- [14] 彭定求. 全唐诗（第893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0092.
- [15]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98.
- [16] 赵丰，王乐. 藏经洞所出千佛刺绣研究[J]. 敦煌研究，2022(2).
- [17] 同[13]:10089.
- [18] 孙继民. 敦煌文书S.964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J]. 敦煌研究，1997(1).
- [19] 赵贞. 唐五代春衣发放考述[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国的背影：吐谷浑慕容智墓出土文物[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242-243.
- [21] 同[7]:125-128.
- [22] 同[2]:66.
- [23] 彭定求. 全唐诗（第419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0:4620.
- [24] 赵丰. 《蚕织图》的版本及所见南宋蚕织技术[J]. 农业考古，1986(1).
- [25] 赵丰主编. 中国丝绸通史[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279.
- [26]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户部（第3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92:82.
- [27]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16:108.
- [28] 刘昉，等. 旧唐书（第174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513-4514.《会昌一品集》别集五《奏绌状》中作“立鹅、天马、蹙豹、盘绌”。
- [29] a.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少府军器监（第22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92:576. b.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第38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267-1269.
- [30] 赵丰主编.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70.

（责任编辑 王亮亮）